

难忘的岁月

时延春*

昔日在也门发生的一些事不时地显现在我的脑海,因为我与友好的也门人民一起参与了这些事,那段时间成了我终身难忘的岁月。

1965年,我大学毕业进入外交部,即被派往开罗大学进修阿拉伯语。文革中断了我的进修计划,于1967年2月回到北京。同年夏,亚非记协书记处第五次会议在京召开,我被临时派去帮忙。会后回到外交部,干部司主管告诉我,也门形势十分紧张,我使馆急需一位懂阿拉伯语的干部前去工作,组织决定派我去。并要求我抓紧时间准备,尽快赶赴也门。我匆忙做了些准备,便于9月离京赴也门,从此,迈出了我外交生涯第一步。

我到馆的当天,从使馆同志们的言谈中强烈地意识到也门正处于风云突变之中,矛盾错综复杂,形势扑朔迷离。

60年代初,风雨飘摇的也门穆塔瓦基利亚王朝苟延残喘,难以为继。1962年9月26日,以萨拉勒上校为首的自由军官组织推翻王室政权,成立了阿拉伯也门共和国,萨拉勒出任总统,军衔虽由上校晋升为元帅,但手中兵力有限,王室势力仍然强大,新生的共和国政权不稳,随时有被颠覆的危险。为保卫共和政权,萨拉勒一方面在国内苦苦支撑,另一方面吁请埃及出兵支援。纳赛尔总统欣然同意派兵7万,驻守也门要害部门,并直接参与反对王室复辟的内战,萨拉勒政权才得以维持。

在1967年的第三次中东战争中,埃及失利,纳赛尔总统决定从也门全部撤军。当时,驻守首都萨那的也门正规军不足5000人,且装备落后,政权内部派系斗争尖锐复杂,共和政权十分不稳,萨拉勒总统如坐针毡,四处寻求援助。我到使馆不到一周,萨拉勒总统紧急召见我郑康平代办,我作为译员陪同前往。我们到达总统官邸,已是晚9时,萨拉勒在官邸花园接见了我们。他高度评价了中也友谊和集中介绍了也门形势后,便单刀直入地要求中国给予援助。走出总统府,郑代办对我说,萨拉

勒总统对也门形势的分析比较客观,实事求是。我们越发感到也门形势的严峻。

萨拉勒总统为能争取到更多外援,决定率团出访。1967年11月5日,在他访问伊拉克时,萨那发生了一场不流血政变,萨拉勒被解除一切职务,埃里亚尼出任共和委员会主席,埃尼任政府总理,阿姆里中将任武装部队总司令,并宣布恪守九二六革命原则,坚持共和。与此同时,人们强烈预感到政局将更加恶化,共和派与王室派间的一场激战迫在眉睫。随着埃及军队的撤离,被推翻的也门王室势力在外国支持下,用重金收买了部分也门部落兵和外国雇佣军计4万余人,力图通过武装叛乱达到复辟王室的目的。他们先切断萨那通往红海滨海城市荷台达的公路,继而分兵从西、东南、西南和北面直扑萨那,对首都形成四面包围之势。1967年11月28日,王室武装兵临萨那城下,把萨那围得水泄不通,开始发起攻城战役。萨那市郊顿成硝烟弥漫的战场,机场及市区处于王室武装炮火的威胁之下,元首办公的共和国宫、要害部门及市中心解放广场连遭炮击,形势十分严峻。在这紧要关头,武装部队总司令阿姆里中将出任战时内阁总理,守卫萨那的数千官兵斗志昂扬,决心背水一战,城中的工人、学生、居民、政府官员、知识分子、商人、退役军人及郊区的农民也都自告奋勇组织起人民抵抗部队,与武装部队及公安部队并肩作战。我的外交生涯就在这样的环境中开始了。

在那些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日子里,除中国大使馆外,其他国家的使领馆已全部撤离萨那。在也门共和政权最困难的时刻,我国政府明确表示坚决支持也门政府和也门人民为维护独立自主,反对帝国主义的颠覆、侵略而进行的正义斗争。我驻也使馆人员、援也工程技术人员及医疗队队员一直留在萨

* 作者曾任我驻也门、叙利亚大使。现为世界知识出版社总编辑。

那,与也门人民同呼吸,共命运。

当时,使馆仅9位同志,懂外文的两人,而懂阿语的只我一个,人少任务重,既要及时向国内报告也门形势的发展和战局变化,又要与也门军政部门、群众团体、各界人士保持联系与负责在也门的全体中国人员的生活与安全。因而工作量很大,对刚步入外交生涯的我,既是考验,也是锻炼。

这段生活和工作很值得我回味。坦率地讲,我是在一种半清醒半朦胧的思想状况下进入角色的。开始,我虽对自己面临环境的严酷性有一定的思想准备,但对一个刚参加工作就进入枪林弹雨中的知识分子来说,难免有些慌乱,有些情况不知如何应对。郑代办曾参加过解放战争,打过仗,负过伤,经验丰富,他向我传授了很多军事常识和应对经验,对我大有裨益,使我逐渐适应了这种战时外交工作。当时,我把青山到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写成座右铭,摆在床边。同时,我在实践中注意观察、分析、研究和总结,逐渐掌握了交战双方的一些规律,心里踏实多了。

时光流逝,尽管昔日的亲身经历已成遥远的故事,但每当我们谈及那段历史,记忆的屏幕便会出现那些激动人心的场景。

那时,我驻也馆邸是租用的房子,条件简陋,没有安全感。我的宿舍和办公室均在平房,无设防。使馆距萨那南郊民用机场仅1公里,处于王室武装火力重点射区之内。每天,炮弹的爆炸声、子弹的呼啸声和坦克的隆隆声不绝于耳。有几次,我在办公室听到震耳欲聋的爆炸声,顿感整座房子都在震动,窗玻璃全被震碎。爆炸过后,我走出房间观察,看到距使馆仅100米处有好几个大坑,使馆楼顶和院子里是一层弹片和砂石。有一次,我正在办公室赶译一份照会,突然听到使馆附近枪声大作,炮声隆隆,我迅速跑出门外观察,刚爬到主楼楼顶,立即听到子弹飞过的嗖嗖声,我急忙躲避的一刹那间,一颗子弹擦我头顶而过,落在离我仅半米的地方。我心中一震,赶紧躲到隐蔽处,继续观察,终于看清了周围的一切。原来使馆周围已变成战场,但战场的主动权仍在共和派手中。使馆东南面有大片空地,子弹就是从那里飞来的。使馆正门前是条宽阔街道,停着几辆坦克和装甲车,坦克炮不时冒出火焰,正在炮击敌方,发出震耳欲聋的声响。我

看了会,从楼顶下来,走到大门处,从门缝中向外看,发现也门派往我使馆的警卫正贴近大门观战,我隔门问他是谁在指挥作战。他说,中间一辆坦克中坐着也门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阿姆里中将,正在亲自指挥作战。我听后,越发感到时局严重。不一会儿,使馆门前的坦克和装甲车开走了,枪炮声也停了。我大着胆子走出大门,拣了些炮弹壳,当作烟灰缸。这个烟灰缸一直伴随到我离任。后来听说使馆将这个空炮弹壳保存到了80年代初。

萨那保卫战是场拉锯战。因工作需要,我几乎每天外出,在枪林弹雨中穿行。虽险象环生,但我习以为常了,早把生死置之度外。

伊拉克驻也门使馆坐落在共和国宫附近,属王室武装重点炮击处。随着形势恶化,伊精简了驻萨那使馆人员。王室武装炮击共和国宫时常有误差,多次击中伊使馆。伊使馆不得不采取应急措施,将人员移住穆哈旅馆,必要时代办才到使馆办公。在伊使馆撤离萨那前,夏仲成同志和我要见伊代办,我们按事先约定的时间到了伊拉克使馆。进门后,伊代办与我们热情握手表示欢迎,但建议立即转移到穆哈旅馆,以防不测。果然,我们离开不到5分钟,伊使馆便遭炮击。我们到达穆哈旅馆时,伊使馆人员与我们紧紧拥抱,为我们死里逃生庆幸。

当时我援也建造的萨那纺织厂地处萨那东北部,纺织工作组、公路工作组和水源队人员的宿舍都在纺织厂旁边。萨那被围期间,纺织厂附近有一兵营,驻有一支守城部队,但纺织厂东北方的一座山却被王室武装占领,他们居高临下,不时派人下山偷袭、骚扰,战火时刻威胁着纺织厂、兵营和我援助也门人员的安全,中国各队、组人员的宿舍和施工机械设备都遭到严重破坏。在这场战争中,中国人员英勇顽强,沉着镇定,服从纪律,如遇炮击,他们便立即疏散到厂房和宿舍楼内,炮击间歇期间,又扑向施工现场,抢救财产。

我使馆人员常去这些队、组慰问和了解情况,尽量帮助他们排忧解难。有段时间,王室武装对纺织厂周围的炮击非常频繁,我使馆人员也碰到过多次。一次,我们开车去那里,刚进楼5分钟,王室武装开始炮击,为避免伤亡,我们躲在楼里观察。炮击中,我们的车被击毁。还有一次,郑代办去公路组指导工作,恰恰遇上王室武装3个小时的炮击。

炮击开始时，我在使馆，过了些时候，不见郑代办返回，而纺织厂地区的事态又越来越严重，我们立即叫上医疗队的外科医生去那里营救。当我们接近炮击区时，仍不见炮火间断的迹象，只好找了个土坡作掩护，像战壕的战士一样焦急地等待发起冲锋的时机。约中午12时30分，我们乘王室武装炮击的间歇，快速奔向处于危险的战友处。此时，郑代办他们也迅速冲出危险区，我们像久别重逢的战友，热烈握手，一颗颗激动的心久久难以平静。

萨那被围的局面每拖延一日，城内军民的困难便增加一分。一方面，共和派与王室派间的矛盾仍存，另一方面，随着萨那战局的发展，共和派内的矛盾也在发展，且逐渐趋向公开、尖锐。这两对矛盾交织一起，使形势更趋紧张，也增加了我们工作的难度。1968年8月23日中午时分，我们获悉，近一两天内，共和派内部有可能会发生大规模的兄弟阋墙事件，届时，王室武装很可能乘机发起攻城战役。如是，我们将面临极为严峻的局面。作为一馆之长的郑代办深感问题严重，他当机立断，对馆内工作做了安排，要我立即跟他一起到中国驻也各单位通报情况，布置应变措施。我们马不停蹄，由远而近地走遍各单位，最后到达新华社分社。谈完工作已近黄昏，分社同志要留我们吃过饭再走。我们婉言谢绝后，便起身返馆。我们刚走出分社的门楼，就听到四处响起枪炮声。我们断定，也门武装部队两派间的大规模武装冲突已全面打响，只好退回分社楼内，立即与有关方面联系。从了解到的情况表明，冲突的主要战场在市区，萨那城内几乎到处都成了战场，谁也说不准这场冲突何时能结束，我们何时能返回使馆和如何返回。

夜幕降临，战况愈来愈激烈，丝毫没有停止迹象。郑代办心急如焚，决定冒险尽快返馆，但道路已被切断，如强行开车，目标太大，危险性也更大，于是决定步行返馆。我们3人组成一个战斗小组，我会阿语，充当尖兵，郑代办居中，司机老姜断后。郑代办一再提醒我们，不走街道中间，要紧贴道旁的墙壁前进，如遇险情，立即卧倒，或隐蔽起来。我们走上街时，路灯都已熄灭，但皓月当空，在皎洁的月光下，我们小心翼翼地贴墙向前行走，脚下不时碰到炮弹碎片，远处不时传来隆隆的炮声，头上时有子弹呼啸而过。我们快临近医疗队驻地时，

突遇险情。医疗队对面的一幢三层楼的主人是也门人民军司令，是也门最大部落的第二号人物，司令虽支持共和制，但为自身安全考虑，他在楼顶和周围都布有荷枪实弹的重兵。当他们发现我们时，一下全都做好了战斗准备，我清楚地听到一阵拉枪栓的声音，接着从楼顶传来急促的问话：你们是什么人？我立即用阿语回答：中国人。他们大声对我们说：中国人，萨迪格（朋友），我们保护你们的安全。他们不仅让我们通过，还派人护送我们。晚9时左右，我们终于安全回到使馆。

我们回馆后，外面的交火仍在持续。我们继续密切观察事态的发展，午夜后，形势发生了戏剧性变化，萨那的枪炮声突然停息，但远方却传来枪炮声。后据了解，王室武装企图借共和两派内讧之机，发起攻城战役，突破口选在萨那东部努古姆山的制高点。紧要关头共和两派立即达成停火协议，调转枪口，共同对付王室武装的进攻。经数小时激战，王室武装的进攻被打退，萨那出现短暂的平静。

那一夜，我们彻夜未眠，却精神饱满。东方升起曙光后，郑代办吩咐我们分头与我驻萨那各单位联系，了解情况，对他们进行慰问，我负责与医疗队联系。当时医疗队住在使馆东、西的两幢房子内，我先到使馆西面的那栋房子，见所有人员安然无恙，房屋也未遭破坏，便去使馆东侧的房子，按习惯我敲了敲门后，足足等了10分钟，却无动静，我又用力敲门，大声喊叫，仍无反应。我不免犯了猜疑，莫非出了问题？于是，我绕到东墙根，见这里的一段围墙已被炮弹击垮，便越过断垣残壁，踏进院内。院内到处是砖头瓦片和弹壳弹片，我三步并作两步地奔向房门，一边敲门一边呼叫，终于听到屋内的应声。出来开门的是从北京医院来的外科王医生，他告诉我，为抢救伤员，他们整整忙了一天一夜，天亮前才回到住所，刚睡了两三个小时。随后我又见到另外几位医生，他们正在烧水煮饭，我这才放心。他们告诉我，医院里有很多伤病号急需手术，他们饭后要立即赶往医院。我望着这些医生，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什么炮火袭击啦，个人安危啦，全被他们丢在脑后，全身心地投入到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工作中去，多么崇高的白衣天使啊！

萨那保卫战期间，中国援也医疗队的功绩真值

得称道。战前，萨那只有少量中国医生和护士，医疗队的大部分人员都分在也门各地工作，萨那告急后，其他国家的医生已全部撤走，在萨那的3名中国医生与仅有的几名也门医务人员不得不承担起萨那的全部救护任务。随着战火的延续，守城的也门军民伤病员不断增力，急需医护人员抢救护理。阿德里总理为此召见郑代办，吁请毛主席、周总理向也门紧急增派医护人员。我们立即将也方的请求报告国内，有关部门又将情况报告了周总理。周总理当机立断，指示北京医院立即组派援也医疗队，尽快赴也。医疗队迅速组成，紧急赴任。由于萨那机场处于王室武装炮火威胁下，他们乘坐的飞机在机场上空久久盘旋，乘炮火的间隙强行着陆。他们抵达萨那后，立即全力抢救伤病员。在那些日子，他们每天只能休息三四个小时，眼熬红了，人消瘦了，但仍然夜以继日地工作，受到也门各界人士的高度赞扬。

萨那被围期间，我们的工作环境和生活条件极为艰苦，由于形势紧张，不仅要加倍工作，还要做好抗暴准备。每天上午，我几乎都在外面冒着枪林弹雨联系工作，下午或晚上用来阅报、听广播、翻译材料，一天工作12~14小时。为防不测，使馆规定每晚必须有人值班，由于人手少，便从工程技术组和医疗队抽调部分人员来馆协助。每晚6点半到次日6时，我们轮流值班巡逻，负责使馆的保卫工作。当时，一人总要承担几个人的工作，忙完白天，匆匆吃过晚饭又马上参加值夜班，我们称之为日以继夜。有时，刚上完夜班，又碰上紧急任务，便得连续工作，我们又称之为夜以继日。那时，我们的津贴只有39元人民币，物资匮乏，值夜班时，无法提供夜餐，长达12小时的巡逻确实难熬，特别到下半夜，真可谓是饥寒交迫。当轮到我值班时，我便动用自己微薄的津贴，从使馆小卖部买些烟酒，与同我一道值班的同志共享。如一个月轮到几次夜班，月津贴便入不敷出，只好借贷。萨那形势好转后，我们才逐渐还清自己的债务。

萨那被困期间，物资供应困难，食品奇缺，我们的生活条件变得极为艰苦，一连数月，几乎买不到蔬菜和水果，米、面也所剩无几，面临断炊危机。为解决吃饭问题，我每月都打一份照会，与也门经济部联系，请他们帮助解决。只有经经济部长亲自

批条，才能买到一定数量的大米。在这种特殊环境中，根本谈不上文化娱乐生活。由于陆路和空中交通均被卡断，我们多月都收不到家信。条件尽管艰苦，大家却毫无怨言，个个精神饱满，斗志昂扬，体现了新中国外交人员的精神面貌与风格。

经过激烈战斗，共和派取得胜利。由于我国政府坚持正义立场，中国大使馆是留在萨那的唯一使馆，中国在也门军民中的威信大增，中也友谊继续发展，这引起少数王室分子的不满，他们中的少数人蓄意挑起反华事端。1968年夏，我接连收到多封恐吓信，威胁说中国人必须从也门滚出去，否则，将向你们开出红色火焰的枪。有的恐吓信中还放有子弹，与此同时，我还接到用阿拉伯语打来的类似内容的电话。针对这种情况，郑代办约见也门外交部负责人，进行口头交涉，强调我致力于中也友谊，支持也门的正义斗争，不干涉也门内政的立场，要求也门政府警惕有人在搞破坏中也友谊的阴谋。这次交涉收到良好效果。

面对一小撮反华分子的恐吓活动，我们提高了警惕，但并未退缩，一如既往地忙碌着。经过前一段的战火锻炼，增添了我们的勇气，也门军方也常请我们到守城部队营房放映《英雄儿女》、《南征北战》等战斗故事片，以鼓舞士气。我们总是有求必应，夏仲成、司机和我组成三人小组，拉着放映机前去放映，由我用麦克风进行翻译，回到使馆一般都在午夜左右。有的军营较远，路途不太安全，也军方就派武装警卫护送我们回使馆。

萨那保卫战取得第一回合胜利后，也门政府决定有限度地恢复通往萨那的航班，但鉴于王室武装仍然盘踞着萨那附近的一些军事要地，威胁着萨那安全，也门航空公司的飞机一般都在深夜起降，来去都很快，以免遭王室武装炮击。为应急，我们的信使和其他人员只好乘坐这些飞机，而我们三人小组便承担起迎送任务。每当接到反华分子的恐吓信和电话，我们都要进行认真分析和研究，采取相应对策。夜间去机场也是一场战斗，每次出发前都得做好充分准备，以迎接不测事件发生，安全完成任务。

也门共和派力量经一年多浴血奋战，在军事上取得萨那保卫战的胜利。此后，经沙特调解，共和与王室两派开始了政治谈判，于1970年5月达成

协议，结束了内战。

1970年5月的一天，我去内政部办事，与内政部长拉荷米不期而遇，他是也门共和国开国元勋，曾担任过武装部队总参谋长，一直致力于中也友好，他对我说，共和派与王室派已经和解，部分王室要员将回国参政，过几天将在也门和沙特接壤的边境城镇哈腊德举行和解仪式。如中国使馆或新华社要派员前往观察仪式情况，表示欢迎，并保证中国朋友的安全，并要我将此报告中国大使。我立即向王芳杰大使作了汇报。王大使是位少将，他认为这是也门政治中的一件大事，也是我们了解情况的好机会，决定派我和记者老温前往。

按也门方面安排，我们乘坐的越野车随车队先到红海之滨的荷台达，受到荷台达省长的热烈欢迎。第二天清晨出发，经近一天的长途跋涉，天黑前到达哈腊德镇。哈腊德名为镇，但非常荒凉，难以接待如此庞大的来宾队伍，也方虽准备了帐篷，但来宾大大超过预计，帐篷都拥挤不堪。我们三人主动退出，在车里半睡半醒地过了一夜。

第三天上午，也门共和政权与王室代表举行了和解仪式。午饭后，一些人员开始启程回萨那，我们也计划早点返回，可也门方却突然告诉我们，萨那将派飞机来接，但限于哈腊德镇只有简易机场，来机载客有限，只分给我们一个名额。经商量，决定让记者老温乘机尽快赶回萨那发消息，但直到黄昏时刻，飞机才来，我们目睹老温上了飞机，才离开哈腊德镇。

司机老刘是四川人，当过兵，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为人诚实，吃苦耐劳，技术高超，经验丰富，在那次出差中，他不仅吃不好，睡不好，最令他头痛的是车不争气。前两天都是白天行车，跟随大队行动，老刘紧赶慢赶，总算顺利到达目的地，但我们在归途中却遇到麻烦。因那天下午等飞机，我们延误了启程时间，不得不随小队人马夜间行驶。出发三小时后，天已全黑，老刘集中精力，才能跟上前面的车，但当我们经过一个村庄时，问题发生了。这个村子胡同多、窄，且拐弯多，前面的车七转八拐，把我们甩在后面。当我们的车来到十字路口时，不知开向何方。此时天已很晚，人地生疏，找不到人问路，便决定开车出村再说。谁知我们选择了一条与归途相反方向的路。

出村后，老刘加大油门，力图追上前面的车队。我们行驶一阵，仍不见任何灯光，心里不免犯了嘀咕。又向前行驶了一阵，突然发现一些沙丘，我们停下观望，借着车灯，见一只野兔一跃而过。我们断定这里是沙漠边缘地带，不能再前行了。由于夜间行车，又是沙丘地带，我们的行动变得十分困难，老刘谨慎驾驶，但仍是险象环生，忽而一个大坑，如刹车不及，就会连人带车掉进坑中，后果不堪设想；忽而开到沙丘脚下，如不及时倒车，有可能陷入沙中而不能自拔。就这样，我们挣扎了近两个小时，仍不能冲出险区。我们心急如焚，强烈地意识到，必须在天亮前离开这里，太阳出来，这里的气温很快会升到摄氏40~50度，车子不能开，备用水也已用光，等待我们的将是死亡。就在我们奋力拼搏时，突然望见远方有个正向我们移近的亮光。我们意识到，这是向我们开来的车的车灯。老刘赶紧打开车灯，按响喇叭，过了些时候，两车会合后，才知前来搭救我们的是也门武装部队的通讯部官兵。车上的官兵告诉我们，当他们到达一个村落休息时，发现中国朋友不见了，决定分头寻找。我们再三表示感谢，接着就跟随他们到了那个村落。村里有一口井，我们开怀畅饮，又装好备用水。到天亮时，分头找我们的其他车辆也已先后返回，我们再次对他们表示深切的谢意。

到达荷台达时，我们已疲惫不堪，倒头便睡。在过去的两天两夜中，我们只睡了三四个小时，且在连续拼搏，怎能不劳累呢！第五天，我们安全返回使馆，同志们听了我们的经历，都为我们大难不死感到庆幸。

也门局势平静后，我的任期已满，按规定，应离任回国或休假。但使馆再三挽留，国内也正处于文革时期，人员调配困难，我只好超期服役。每隔半年，通知我再延长一段时间，直到1972年4月，我才离任回国。掐指一算，已连续服役4年7个月，中间没有休假。我在海拔2400多米的高原城市萨那度过了自己美好的青春岁月，其中相当一段时间是在战火中度过的。回到北京时，我既感慨也自豪，因为经受了考验，完成了一个外交人员应尽的职责，战火锻炼了我的意志，艰难困苦使我更加坚强。

萨那保卫战期间，我驻萨那使馆和援也的各工

作队组的同志们没有辜负祖国的期望,以实际行动体现了我国的外交政策,国内对同志们的表现给予了高度评价,外交部、对外经委、交通部、纺织部、地质部、建工部等单位多次联合致电使馆,表扬使馆和工作组的同志们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国际主义精神,对同志们在不顾个人安危的英勇行为和高尚品质致以崇高敬意和亲切慰问。我国支持也门政府和人民正义斗争的立场备受也门政府和各界人士赞扬,我们在萨那坚守工作岗位,与他们同呼吸、共患难的实际行动受到他们的好评。当时,也门领导人频频接见我使馆临时代办等人员,主动介绍战局发展和也门政府的对策,高度评价中也友谊,感谢中国向也门提供了大量真诚无私的援助。阿姆里总理赞扬中国是也门最忠诚、最可靠的朋友。也门武装部队的官兵、坚持共和的部落酋长、各群众团体和各界人士都把我们视为真正的朋友,我们每到一处,也门人民就向我们翘起大拇指,连声喊道:隋尼,塔马姆(中国,棒)!也门人民抵抗部队司令对我们说:中国人是我们最可靠的朋友,你们临危不惧,给也门增加了坚强的信心和力量。一位市民对我们说:在危急关头,我不得不想,连你们中国人都还留在萨那,难道也门人不应拿起武器,以生命和鲜血来捍卫革命、捍卫共和吗?说完他情不自禁地高呼毛主席万岁,中国人民万岁。

在艰难的日子里,也门政府十分关注我们的安全和生活,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给予特殊待遇。1967年12月2日晚,王室武装从萨那南面一个制高点炮击机场及周围地区,有3发炮弹落在我使馆南侧几十米的地方,爆炸后浓烟滚滚,使馆有强烈震撼,玻璃被震碎。也门政府得知后,立即派公安部长、内政部长和武装部队总司令联络官到我馆询问情况,并对使馆人员表示慰问。也门政府也非常关心中国援也的工程技术人员及医疗队员们的安全,尽力采取保护措施。在食品、物资供应极为困难的情况下,也门政府实行战时配给制,但我每次找经济部长批条买粮时,他总是有意多批一些,对中国工程技术人员和医疗队也给予特殊照顾。他常说,你们不惜生命支持我们,我要保证你们的健康,宁愿我饿着肚子,也要让你们吃饱。

在战火纷飞的日子里,也门武装部队士气鼓动

部负责人常陪我们走访萨那兵营,每到一处,我们都受到官兵们的热烈欢迎。一次,我们到伞兵部队司令部,正赶上他们开会,司令立即宣布暂时休会,把我们迎进会客室,让参谋长铺开作战地图,向我们介绍他们的作战方案,并告诉我们,请中国朋友暂时不要到作战区去。两天后,伞兵部队果然对王室武装发动了一次成功的袭击。

也门军民经过70天的浴血奋战,取得萨那保卫战第一回合的胜利,这便是也门家喻户晓的七十天战斗。1968年1月底2月初,共和派力量从萨那和荷台达两处同时出击,击溃荷台达至萨那公路上的王室武装。2月6日,打通荷台达至萨那公路的捷报传来,萨那军民群情激昂,齐集解放广场,载歌载舞,鸣枪庆祝胜利。我们到达时,欢庆的人们把我们团团围住,高呼毛主席万岁,中也友谊万岁。当晚6时半,经济部长等5人亲自到我使馆报捷,他们表示,也门军民打通荷萨公路的胜利,也是中国人民的胜利。他们代表也门政府和人民,对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大力支持表示衷心感谢。

根据也门领导人的要求,为支持也门人民的正义斗争,经毛主席和周总理批准,我国向也门提供了一批轻武器装备。这批武器于1968年3月中旬运抵荷台达港,我陪郑代办前去办理移交手续。也门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阿姆里中也将也亲自到荷台达港接货。办完交接手续后,阿姆里总理在荷台达共和国宫举行了午宴,答谢中国提供的宝贵援助,感谢中国政府和人民对也门政府和人民的深情厚谊。他说,也门咖啡是世界最好的咖啡,他特意选了5包优质咖啡,请船长带回中国,送给毛主席和周总理等中国领导人,还特别嘱咐:不要忘记,一定要给毛主席两份。

当萨那出现一小股反华逆流时,也门朋友立即向我们通报信息。也门外交部负责人明确表示,致力于加强和巩固中也友谊是也门政府的一贯方针,萨那一小撮人的举动旨在向也门政府挑衅,妄图挑拨也中两国政府和人民间的友好关系,但这一阴谋不会得逞。也门政府一定要追查坏人,对破坏两国关系的人给予严厉打击。也方派到我使馆的警卫班长特意对我说,也门内政部已通知他们,如发现有人散布反华谣言,立即扭送警察局。

1968年9月30日晚,郑代办在使馆举行国庆

招待会，也门国家元首埃里亚尼主席率副总理、多名部长和大批高级军官出席。埃里亚尼主席发表长篇即席讲话，高度赞扬中国向也门提供的援助和也中两国间的友好合作关系，强调帝国主义是也中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他在讲话最后高呼也中友谊万岁。席间，他对郑代办说：因身体不适，我本想事前道歉，让别人代表我出席这个招待会，但因中国国庆是个伟大节日，应该共庆，还是坚持来了。也门报刊对我国庆庆祝活动作了充分报道，大力赞扬也中友谊，高度评价中国对也门的支持与援助。

萨那保卫战作为光辉的一页已载入也门史册，也门把这事件视为也门共和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同时，也门也把中国支持也门共和作为也中友好关系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也门各界人士每谈到也中关系，总要赞扬萨那保卫战期间中国使馆和中国援也人员们的表现。萨利赫总统参加过萨那保卫战，立过功。1987年底他访华时，大谈这段历史，并向经历过萨那保卫战的中国人员代表颁发勋章。

患难知真情，友谊历久弥新。时隔20多年后，我重返也门工作，对这一哲理有更深体会。1994年11月，我被任命为驻亚丁总领事，1995年3月初到任，也各界人士都把我作为老朋友，视我为参与捍卫也门共和政权战斗的好朋友，尤其在与当年共同经历过这段历史的友人晤谈时，感情非同寻常。

加尼总理当时始任卫生部长，继任中央银行总裁，与我们工作联系较多。1996年3月，当他作为总理到亚丁视察工作时，专门接见了我们，我们进行了亲切的交谈，共同回忆了萨那保卫战的情景。他赞扬并感谢中国向也门提供的宝贵支持与援助，高度评价中也友好合作关系。他强调指出，也中两国共同的历史遭遇，应该互相支持，也门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并预祝香港顺利回归中国。

副总理兼石油部长阿塔尔博士曾任经济部长，在萨那保卫战中，是与我们往来最频繁的也门政府部长之一。1996年5月，当我去萨那参加接待吴邦国副总理访也时，与阿塔尔副总理多次见面。谈到昔日的战斗生活时，我们都很兴奋。我提及当时他作为经济部长批条子有意多给我们一份粮时，对他再次表示感谢。他惬意地笑着说，对于与我们共患难的朋友来说，这是我们最起码应该做的。我们都为久经考验的中也友谊不断发展而感到高兴。

萨那市长马斯瓦里与我同庚，当年作为一名年青英俊的军官，担任筹划、指挥作战的重任。后他不足30岁就升任也门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那时，我们见面机会多，知道他喜欢运动，总爱在打仗之余打打篮球，于是，我们常在战斗间隙安排篮球赛。1996年4月，当我们在萨那见面时，都很激动，紧紧拥抱，合影留念。我们共同回忆了当年的战斗生活和一起打篮球的情景。他以最真挚的感情、最美好的语言盛赞中也友好合作关系。他表示，他在首都市长岗位上将不遗余力地做出努力，推动中也友谊继续向前发展。

在一次招待会上，我见到也门军队杂志主编马斯欧迪上校。萨那保卫战期间，他是也门武装部队士气鼓动部负责人，常陪同我们到各部队参观、放电影。此次可谓久别重逢，分外亲切，我们紧紧拥抱，互道久别之情，激动之心难以言表。

我们都是中也友谊的见证人，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做出过努力，推动友谊不断发展。1996年，适逢中也建交40周年，在这40年间，国际形势和中也两国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唯有中也友谊依然如故。一位也门朋友在报纸上发表了过一篇题为《真挚的也中友谊》的文章，他说，中也友谊源远流长，深入人心。这种友谊之所以如此真挚、纯洁，其主要原因在于它是建立在互相尊重、互相信任、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有好合作的牢固基础之上的。也门非常珍视这种友谊。

1997年5月，我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也门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同年9月赴任。从我作为译员第一次赴也到此次就任大使，整整30年过去了。萨那发生了巨大变化，但这座城市中仍然保存着不少昔日萨那保卫战的遗迹。也门政府将市内的一条主街命名为“七十天大街”，把在重大节日举办盛大阅兵式和群众集会的广场命名为“七十天广场”，旨在让萨那保卫战的英雄业绩世代相传。也门百科全书和大量著作都把萨那保卫战视为也门共和史诗。我在萨那见到许多昔日同甘苦、同患难的老朋友，惜别多年后再次重逢的激动心情难以言表。也门各阶层人士也纷纷赞扬中国支持也门人民正义斗争的坚定立场。

在我回首往事，追忆起萨那保卫战那段难忘的岁月时，我衷心祝愿中也友谊之花开得更加灿烂。